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2017-09-11 04: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闫伟 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本期主持：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本期主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往

主持人语

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和国家经历了从相互孤立隔绝到彼此交流融合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前，东西方之间便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建立起联系。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海上的，借由丝绸之路这一重要通道，东西方的物产、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得以传播、扩散，为人类文明交流史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中外学人的目光，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人口、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多为西方话语所控制。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终于扭转了“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局面，我国丝路研究取得真正意义的进展，如今的丝路研究已成为各国专家学者共同耕耘的园地。东西方文明交流史是丝路研究中的重要命题，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历史上中国与罗马

帝国、波斯以及缅甸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以期窥见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图景。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与古代波斯已有间接交往。中国的丝绸通过北方草原或经由印度传入波斯。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与中国的交往加强。中国曾多次发现刻有“居鲁士圆柱”铭文的马骨，说明两国在居鲁士时期或已有直接联系。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中国与波斯首次建立直接联系。《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王密特里达提二世令两万骑迎汉使于波斯东界，随后遣使中国。从公元87年到公元101年，波斯两次遣使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萨珊波斯使节出使中国十余次。

由于政局变动，中波政治联系时有中断，但贸易、文化交往不绝于缕。中国有希腊和罗马不可企及的技术，故波斯十分珍视与中国的交往。波斯谚语有云：“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意指中国不仅精通理论，还拥有技术。此时，波斯将对外交往的重心转向东方，成为沟通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并一度垄断丝绸贸易。近年来，中国出土上千枚萨珊波斯银币，足见当时波斯商人与中国贸易交往的活跃。

丝绸之路的兴盛还激发了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往。安息王朝时期，许多波斯佛僧来华传教。早期的汉译佛经多为安息僧翻译，波斯人安世高是最早在汉地译经的翻译家，自公元148年始共译出佛经百余部。当时著名的波斯译经家还有安玄、昙谛、安法贤、安吉藏等，南北朝的名僧菩提达摩可能也是波斯人。

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高峰。唐初，适逢阿拉伯帝国崛起，对萨珊波斯王国带来威胁，萨珊波斯君主伊嗣俟三世3次遣使来华求援。波斯亡国后，波斯王子卑路斯获得唐廷庇护，被封为波斯王，以扎兰季城（今为阿富汗尼姆鲁兹省首府）为都。卑路斯复国未果，客居于长安，唐高宗授之以右威卫将军。卑路斯亡于长安，其子泥涅斯承袭波斯王的封号。唐朝甚至一度出兵协助泥涅斯复国。

萨珊波斯亡国影响了唐朝与波斯的政治交往，但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中国史籍称波斯商品为“波斯货”，波斯人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唐代诗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他撰写的《海药

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归”，甚至被授予高官，其中尤以安附国和阿罗喊为要。杜环的《经行记》和波斯人忽尔达兹比的《道里与诸国志》等记载了唐代两国的民间交往。

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元明时期，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东西方交通臻于鼎盛。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合赞汗时期，伊尔汗国的驿道直通中土。《金史》有云：“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伊尔汗国统治者皆获得元帝册封，元朝赐之以篆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宝印。伊尔汗国奉元帝为宗主，对元朝遣使不辍。明朝初年，帖木儿3次遣使明朝，递交国书和国礼。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也曾回访帖木儿帝国。1405年，帖木儿暴毙，沙哈鲁继位，中国史书称为“哈烈国”。从1368年到1581年，波斯遣使中国50余次。永乐年间，明廷派遣陈诚3次出使哈烈国。1417年，

明朝的使团高达300余人，哈烈国回访使团更是达到600余人。明朝在波斯的政治影响甚大，甚至调解波斯的政治纷争。明朝给哈烈国的国书中称："永结成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随所愿。"嘉靖朝不堪入贡之重负，限制西域诸藩入贡，至此中国与波斯的联系日渐疏远。

与唐宋时期相比，元明时期的中国与波斯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更为深入，其中中医、陶瓷、绘画等对波斯影响甚大。早在10世纪，阿维森纳的《医典》就介绍了中医的脉学，拉施特的《中国药学》收录了中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苏沈良方》等。当代伊朗裔学者玛扎海里认为，波斯医学的药剂半数来自中国。旭烈兀曾从中国招募1000余名工匠，在波斯烧制瓷器、绘画，营造中式建筑。中国画与波斯绘画逐渐融合，波斯细密画由此产生；中国的缝纫技术、服饰、衣橱等在波斯也十分流行。

波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郭守敬在研定《授时历》时就参考了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的《万年历》。15世纪前后，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篇《蔷薇园》《果园》传入，并流传至今。元明两朝分别设立回回国子学、四夷馆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波斯语在元代是除汉语、蒙古语之外的第三种官方语言。可以

说，波斯语是古代除梵语之外影响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外来语言，也是古代汉语外来词汇的重要来源。波斯的苏麻离青与中国陶瓷技艺的融合，还催生了元青花。

元明之际，大量旅行家往来于两国，加强了双方的认知。陈诚和李暹的《西域行程记》《西域藩国志》，马欢、费信和龚珍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详细记载了波斯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波斯的《中国人的治国策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国志》等亦介绍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社会风俗，并高度推崇中国文化。《中国志》有云："我们从未听说过世界上存在有另一个与中国一样完美政府的国家。"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认为，中国艺术是"不可企及的完善标准"。

中国与波斯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两大文明在相互碰撞、互鉴、交融和创新中不断地将异质文明内化为各自的本土文明，丰富、拓展了两国的文化内涵，为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从波斯引进大量物产，如葡萄、石榴、黄瓜、胡椒等植物约50种，而波斯学习中国丝绸、铁器、瓷器的生产技术，获利甚巨。中国与波斯的交往使东西方物种交流、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文明传承和创新成为可能，客观上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纽带，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光明日报》（ 2017 年 09 月 11 日 14 版）